

家庭“小账本”里的40年民生巨变



新华社大连12月6日电(记者蔡拥军、郭翔)收入增长越来越快、白菜萝卜让出餐桌主角、旅游踏遍万水千山……这几天,77岁的大连市民安邦才整理了近十年来家庭“小账本”上的近5万笔收支记录。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些数字,有的羞涩,记载着曾经的贫困;但更多的则像欢乐的音符,在账本上起舞,欢呼着改革开放40年来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条向上的曲线

1956年至今,安邦才共记了8本、近5万笔收支账。每一本账本,都像档案一样在封皮上标注了起止年月。账本严格区分收入、支出、项目,并用钢笔工工整整地详细列出,精确到如今已很难见到的每一分钱。收支情况日清、月结、年终汇总。

收入像高铁列车,越跑越快。20世纪70年代,年均收入1370.72元;20世纪80年代,年均收入4491.41元;20世纪90年代,年均收入31124.44元;21世纪第一个10年,年均收入65602.51元;2011年至2017年,年均收入120751.09元。安邦才这几天

手绘了一份收入变化统计图,一条年收入的向上曲线跃然纸上。“我和妻子2017年的总收入达到154040.91元,是1977年的130.87倍。”

随着收入不断增加,安邦才的账本里出现了更多的“大件”。1980年6月13日,安邦才的4口之家买了第一台现代家电:大连产黑白电视机,花费420元;1987年7月7日,他花费1770元购买了电冰箱……“这些当年的镇宅之宝”早就受到冷遇。”安邦才说,“这些年,家里的电视机换了4茬,电冰箱换了3茬,电脑换了2茬。”

账本里除了收入向上的曲线,还有一条支出变化的曲线。“20世纪70年代,我们为温饱奔波,常常捉襟见肘,甚至还有赤字。”安邦才说,那10年,家庭年均支出1437.63元,其中为了填饱肚子要支出666.63元,占比45.23%;从2011年至2017年,全家年均支出49986.85元,用于食品的支出为9260.69元,占比下降到21.25%。

一组消失的数据

家境越来越殷实,消费品越来越多

样,档次越来越高……然而,有一组数据却在安邦才的账本里消失了。每到秋末冬初,东北人家都会买上白菜、萝卜等“秋菜”,腌渍、贮存,作为漫漫冬季餐桌上的“新鲜蔬菜”。“1976年11月秋菜上市,家里花了18.48元买了500斤白菜、260斤萝卜。”安邦才说,“那时候我和妻子上班、孩子上学,饭盒里的主菜就是白菜、萝卜。”

如今,安邦才的账本里却难觅“秋菜”踪影,“现在冬季到市场随时都能买到新鲜蔬菜,品种多,白菜、萝卜再也不‘当家’了。”安邦才开玩笑地说:“我的胃口高贵了,海参鲍鱼任我买,羊肉牛排任我选。”

与“秋菜”一同在账本里消失的还有各种票证。“我清楚记得1980年还是托人‘凭票买’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安邦才说,票证从“流通领域”悄然进入了“收藏领域”,热爱收藏的他珍藏着全国17个省的数百枚粮票、布票及各种“商品购买票”。翻阅着一张张票证,回忆着凭票购物的年代,对比着当前越来越丰富的商品、越来越便利的网上购物,安邦才感慨不已。

一种不变的向往

作为父亲和丈夫,安邦才至今对40多年前的一次春节山东探亲之行感到愧疚。“当时亲戚代买了两张去山东烟台的3等舱船票,

让我们‘睡宿好觉’,但3等舱每张票价4.6元,而统舱票价是3.1元,两张票差价加起来有3元。”安邦才说,3元当时差不多能买30多斤玉米面,“为了省钱,我和妻子把票换成了统舱,那一夜,还不用购票的两个女儿在统舱冻得发抖,我们把衣服披到孩子身上,也是一夜未眠。”

家庭年收入从千元到十多万元,安邦才早已不再为“吃穿”发愁,也不会用玉米面来衡量船票的差价,“如今的账本里,家里食品支出大幅下降,旅游、娱乐、收藏等文化消费明显增加。”

一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近10年,安邦才先后外出旅游7次、177天,“我们去了123座城市,花费了35230.93元。”最让安邦才自豪的是4年前的那次红色之旅。2014年9月13日至10月30日,他和妻子用48天的时间,重走红军长征路,从江西瑞金到贵州遵义,再到陕西吴起,以一种独特方式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

从舍不得3块钱到花费3万多元出游,安邦才的家庭“小账本”如同国家这个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这滴水形象地映射出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安邦才每次旅游到一地,都会到邮局请工作人员在他事先手绘的地图上盖上邮戳,“我希望能盖到更多地方的邮戳,见证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孙萍、陆佳飞、陈静)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数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将自己融入改革开放大潮。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友好使者。

“我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美籍律师龙安吉每天都要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晨练,从院子里可以眺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与30多年前龙安吉初来京城看到的天际线迥然不同。

1981年,龙安吉来华留学。他回忆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街头行人的服装基本以蓝色绿色为主。每次他去友谊商店花1美元买一瓶可乐,他的老师都会觉得“败家”。而中国的巨变正在悄然发生。龙安吉也没想到,他的命运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龙安吉帮助一些外企进入中国,并且为中国国企改革提供建议。他见证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也见证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模式转变。2013年,龙安吉受聘担任环保部顾问,负责制定绿色印刷政策的相关工作。“中国政府及时意识到工业发展带来的后果,实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政策,如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和投资、绿色金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龙安吉看来,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到人民币“入篮”、“一带一路”倡议,一个个标志性节点如同一幅幅画卷,记录下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历程。他还撰文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模式,回答中国如何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等外界感兴趣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包括:循序渐进的改革,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提供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

比利时人范克高夫20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我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特别是参与上海轨道交通线的建设和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在范克高夫看来,北京奥运会集中展现了当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每每被友人问起中国改革开放何以如此成功,范克高夫都以亲身体会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得益于中国的行动力和效率。他经长期观察发现,只要中国下决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够做好。“例如,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中国实现了整体开放和平衡发展。”

“我见证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创新中心”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打开,中国的对外科技交流蓬勃发展。1985年,英国华威大学制造工程学院院长巴塔查里亚邀请了一批中国工程师赴该校学习。后来华威大学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两百多家中方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前后约有两万人从华威大学的教育培训项目中获益。

巴塔查里亚告诉记者,他第一次来华时对工程师在中国的地位之高感到惊讶。他感到中国人有通过科技改变社会的激情,也预感中国科技的进步将改变世界。“我的预感已成为现实。我见证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创新中心。”

巴塔查里亚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更多融合了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科技的进步发展。

从在澳大利亚执教,到来中国山东工作,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查尔斯·雷伊·麦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教兴国的轨迹。

麦凯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他教过的许多中国学生毕业后留在了澳大利亚,但后来,回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麦凯多方了解后意识到,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职业发展空间方面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在一名中国学生的建议下,麦凯来到中国从事自己的免疫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走上了科技创新道路,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在麦凯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两大特征,而环保和科技理念也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今,麦凯也入乡随俗,每天骑自行车穿行在济南的街头,出门不带钱包,只带一部智能手机。

“我感到中国人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德国医生夏爱克曾在云南偏远山区工作了15年,现虽已回国但仍时常想念云南和那里的孩子。他说,刚到云南鹤庆县时,整个县城只有一条柏油路,后来有了高速公路。“生活变化之大,不仅我没想到,当地人也没想到。我刚到云南的时候,他们说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但5年后,他们开始买车。10年后,他们有钱出国旅游了。”

在云南,夏爱克看到很多家庭的命运因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和义务教育制度而改变。通过义务教育,不少孩子走出深山,去城市上大学;而新农合政策实施以后,当地医院的软硬件设施越来越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得到大大缓解。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扶贫等事业取得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我感到中国人的获得感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有自信。”夏爱克说。

1974年,拉贾·马加斯韦兰从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留学。毕业后,他留在中国。马加斯韦兰参与了北京亚运会和奥运会期间的城市改造项目,目睹中国人一步步走向幸福生活。

马加斯韦兰认为,身边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的中国朋友普遍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因为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了,这当然要感谢改革开放政策。“从外国人的角度看,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正在经历幸福时代。”

外国专家眼中的改革开放

我感到中国人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神秘矿区”蝶变“5A景区”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6日电(记者张晓龙、周生斌)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有一座蜚声中外的“神秘”小镇。上世纪,它曾是神秘的世界级矿区;经历“蛰伏”后,在最近10年转型为世界级景区。它就是“可可托海”。

可可托海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绿色丛林”。从地质学角度看,可可托海位于阿尔泰山花岗岩晶岩区,稀有金属富集。上世纪50年代起,大量铍、钽、铌等稀有金属从可可托海采掘运出,冶炼提纯变成航空航天和国防尖端制品。

随着市场需求、资源储量的变化,因矿而生的小镇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临生产、经营困局。可可托海“矿二代”、新疆有色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世林介绍,稀有金属出现枯竭后,企业尝试开发云母、碳化硅、铝锭加工等产业,但新疆到内地运距长,完全没有价格优势。

多样化经营并不成功,矿区被迫对职工进行分流,许多去了其他矿区工作。可可托海人口从最多时的五六万人,一度减少到仅1万余人。

2007年,一家山东企业在可可托海一带找矿时,无意间发现了当地的峡谷奇观。

“这些花岗岩地貌奇特瑰丽,令人称奇。经过反复商讨,我们决定改变方向,不搞矿业搞旅游!”山东远方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秀丽说。随后几年,这家企业投入6亿余元,修路造桥、宣传推介,可可托海旅游业开始起步。

然而,受矿业常年萎靡影响,可可托海基础设施较差。特别是半个多世纪的高强度矿业开发,为小镇积累了不少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被国家确定为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试点,矿区综合治理工作开始启动。这项治理工作包括生态治理、基础设施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6大类50项,总投资额37.6亿元。可可托海迎来重大转折。

短短几年,在中央、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沉寂已久的可可托海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上千户危旧住房得以改造,堆积如山的尾矿堆被覆土和植被恢复,通往镇区的公路从以前的九十九道弯山路,变成了平直快捷的隧道公路……

与此同时,可可托海的矿区企业也在积极转型。刘世林介绍,独立工矿区改造开始后,他们成立了新的旅游公司,负责将旧工厂修旧如旧,把矿山改造为旅游景点,重点开发工业遗迹旅游和红色旅游。

他感叹:“从前大家矿山情结太重,总想着开矿谋出路。如今,可可托海的矿业开采虽然全部停止,但我们一样能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

如今,当年的矿洞变为探险者的天堂,立下汗马功劳的选厂成了红色教育基地,通行矿车的老木桥挤满了举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一代代矿山建设者的形象被永远定格,



▲位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可可托海三号矿脉(2018年10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晓龙摄

后人将其塑造成大大小小的雕像,屹立在小镇中心广场。

在可可托海著名的3号矿脉前,“矿三代”讲解员谭胜利一遍遍地讲述着第一代矿工顶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在露天“矿山”手选矿石、肩挑背扛的创业情景。

32岁的他说:“虽然没有像祖辈、父辈那样成为一名矿业工作者,但我觉得已从他们手中接过那根接力棒。”

退休后的31年里,可可托海第一代矿工、86岁的哈德尔每天都会到工作过的矿山、工厂探视一圈。他一度对发展旅游业非常焦虑,甚至抵触,“我担心那些厂矿被拆除,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所有的回忆……”

哈德尔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回忆被完好保留下来。现在,他积极支持孙子加入新成

立的旅游公司,为参观工业遗迹的外地游客做向导。

可可托海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国家矿山公园、“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世界地质公园,承办了中国体育旅游露营大会、西部文学奖颁奖大会、古老毛皮滑雪比赛等一系列重要赛事。

可可托海镇党委书记梁秀江介绍,截至目前,可可托海今年的旅游人数已突破200万人次,全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6000元,增长到现在的15000元,旅游业已成为这座功勋矿区的支柱产业。

在可可托海苏式风格的地质陈列馆内,镌刻着这样一段话,述说着可可托海的历史变迁——

“阿山有情,额河不老。那曾鲜活的话语,那曾传奇的故事,正在新时代的呼唤中款款走来,接续传承。”

“杂乱小村”换颜“幸福院”



新华社兰州12月6日电(记者白丽萍)冬日的阳光洒在上庄村,静谧的小村庄增添了几分温馨。但令记者感到奇怪的是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

“有劳动能力的都出去打工了,这里早已看不见村民蹲墙根打牌、晒太阳的情景。”上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斌说,现在一天能挣100多元,连60多岁的老人都不愿待在家里,村民都勤快起来了,这在交通不便的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走路没路,乘凉没树”,曾是甘肃武威黄羊镇上庄村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原来村子穷,村道狭窄凹凸不平,出行不便阻碍了村民的谋生路,经济长年发展不起来。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上庄村平整土地,按照功能区域统一规划,短短几年,发生了大变化。

村民陈文智最近正在筹划年底买辆小轿车,“按照原来种地几千元的收入,连房子都破败不堪,买车是不敢想的。村子平整土地后,把我们在地里解救出来,出去打工赚个万把元钱很容易。”现在,买车在上庄村已不是新鲜事,他所在的村二组买了40辆车了。

如今让村民更为自豪的是上庄村的“幸福院”。走进村民的民居,清一色的青砖黛瓦中式建筑,一样的落地玻璃出廊门庭,一样的前庭后院。120平方米的房子,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床铺、衣柜、桌椅、电扇齐备,厨房灶台、电饭煲、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黄羊镇党委副书记苏磊文说,贫困户都会住进和其他村民一样的“幸福院”,而且他们搬进来时,什么也不用管,直接“拎包入住”。明年还有62套“幸福院”等待着贫困户入住。

“村容村貌有了改变,村民的素质提高了。”杨斌说,现在,村庄的卫生环境变得干净整洁,村民除了打扫自家门前院落,村路上的垃圾都会顺手打扫,爱干净、讲卫生成了村民的习惯。

上庄村已经彻底脱掉了“污水靠蒸发,街面靠风刮,村貌没人夸”的帽子。笔直的村路把村庄分成了整齐的“网格”,硬化的柏油路路边有渠有水有树;村庄里临街的墙上,画着近百幅遵规守法、家庭和睦的宣传画。

现在,村子快速发展让上庄村村民得实惠的心愿一件一件办成了。



▲在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上庄村文化广场,村里的妇女们跳起广场舞(12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范培坤摄

孩子有去处了。现在有了3400平方米的幼儿园,可容纳500多个孩子,就近入园让村民外出务工没有了后顾之忧。

村民活动有了去处。现在建成了130平方米的乡村大舞台,9726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广场,配套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和各类健身器材,让村民居有所乐。

就业有技能有底气。上庄村引导组建了4家农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养殖小区5处,吸纳养殖户141户;建成千亩饲用型玉米基地1处,参与土地流转贫困

户116户。目前,上庄村贫困户家家都有了脱贫致富产业。

“种麦子、玉米的人少了,种葡萄、西红柿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人多了。农民收入节节攀升,村民人均收入从以前的5000多元上升到如今的15557元。”杨斌说,变化让村里人出去有自豪感。

上庄村紧邻天梯山石窟景区。如今,杨斌正带领村委会谋划在村里建个游客集散中心,争取为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多增加集体收入。